



鲁迅

Lu Xun Xinlun

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青岛大学资助出版



马 新 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新论 / 姜振昌, 刘增人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04 - 8682 - 4

I. ①鲁… II. ①姜…②刘…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368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和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7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学术文库

世纪总结·多维探究·融合创新

——一种鲁迅研究总体视角和框架体系的设计 冯光廉 (3)

创新：鲁迅精神的灵魂和价值核心

——重释鲁迅的总体视角论纲 冯光廉 (27)

鲁迅研究问题的切磋 冯光廉 (38)

论鲁迅系列文学期刊 刘增人 (50)

鲁迅原典文献类型举要 徐鹏绪 (71)

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学”学术史的书写 徐鹏绪 (136)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姜振昌 (173)

鲁迅与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姜振昌 (191)

“当代性”与鲁迅研究三十年 姜振昌 (220)

鲁迅与胡适：现代启蒙的两种可能性 周海波 (226)

传媒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创作 周海波 (235)

鲁迅杂文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当代杂文创作的启示 李玉明 (262)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李玉明 (290)

鲁迅与列夫·舍斯托夫 魏韶华 (300)

论鲁迅的“思想原点”及其克尔凯郭尔之影响 魏韶华 (312)

青年论坛

子君与娜拉 余小杰 (335)

内心苦闷的艺术化解

——《祝福》的心理分析 张龙福 (340)

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

——鲁迅作品教学中的思考 张龙福 (346)

充满张力的寓言化叙事

——重读《孔乙己》 王金胜 (352)

“暴虐”与“复仇”：奴隶时代的心理证词

——论《药》、《阿 Q 正传》的“酷刑”叙事 王金胜 (362)

研究述评

鲁迅研究在青岛大学 魏韶华 (379)

2008 年鲁迅研究综述 崔云伟 刘增人 (389)

学 术 文 库

世纪总结·多维探究·融合创新^①

——一种鲁迅研究总体视角和框架体系的设计

冯光廉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研究的成果数量最多，水平最高，聚集的学术力量最为雄厚，这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当然是件大好事。它对提高我们民族的学术文化素质，带动相关学科发展，促使中国文学一文化走向世界，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毋庸讳言，这同时也给现今和以后的鲁迅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如何在高起点上实现学术研究的突破和超越？研究的课题如此繁多密集，怎样才能寻找到新的研究空间，作出进一步的开拓？在社会急剧变革、种种思潮错综起伏的交互影响下，鲁迅研究曾出现过许多曲折和失误，至今分歧仍然不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反思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梳理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众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提出较具说服力的新鲜见解，等等，都是十分艰难的课题。本书正是在清醒地认识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开始自己的思索和探求，作出自己的设计和建构的。

一、鲁迅的基本特质与本书的总体视角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鲁迅本人对中国现代文化曾经产生深广的影响。鲁迅既是一个具有丰满血肉的活生生的历史主体，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丰厚意蕴与广阔外延的符号主体。作为历史主体与符号主体的统一，鲁迅最基本的特质是什么？对此以往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提法，其中毛泽东提出的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使用最普遍、影响最深广的概括。但这三者的含义该怎样阐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如何把握？其中心点是什么？这种概括同鲁迅的本体实际怎样才能取得更加紧密的契合？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释的。

^① 本文系作者为《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一书所写的导论的前五部分。标题是新拟的。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本书和本文的孕生过程及构想特色，特将作者写的《回眸我的鲁研岁月》第三部分《拓展：建构宏大的格局》附后，以供参考。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这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数百万字的各种体式的创作实绩是最好的证明。但仅以伟大的文学家来界定鲁迅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生的实践活动，除了文学创作，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尽管同文学有一定关联，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所能包容的，而应归属于比文学更为广泛的文化范畴。而且，即使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的内涵和意义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范围内来评估，也是非常不够的，而应该扩展、提升到文化的深广的空间。

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同样是颇有道理的，但仍可进行某些辨析和阐释。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的界定，思想家是指“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到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①。现今学者几乎都认为鲁迅并不是精心建构自己完整体系的思辨家。他的精深独到的见地往往以断片的形式，散落在生动丰富的具象（意象）之中。因此，离开这一总体特点，而将他归入“能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之列，未必真正切合鲁迅的本体实际。退一步讲，鲁迅提出的深刻精到的见解，大都是没有离开文学—文化而单独建构的。恰恰相反，几乎都是从这里生发开去，并进行深化和升华的。故而，其主旨意蕴仍然应该归结到文化方面。对鲁迅而言，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文学家的称谓，似乎可以一同归属于文化人物这一总体范畴之中。

关于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的提法，当然也是正确的，但应该作若干的具体的说明和界定。一般说来，能够担当起一个革命家的称谓的人，既要有革命的观念，也要有革命的实践活动，而且他的实践活动还应该对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一定影响。诚然，鲁迅一生参加过不少政治性活动，如早年参加光复会，拥护辛亥革命，支持女师大风潮，反对北洋军阀势力对学生的压迫和屠杀，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和不抵抗主义，反对日寇的侵华暴行，等等。但总体观之，这些活动所占时间不长，比重不大，而且其中不少是偶尔为之，或基本上是挂名性的，远不足以说明鲁迅是政治家意义上的革命家。过去，许多研究者虽曾刻意考寻，精心论析而终致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其根本原因恐怕是由鲁迅的本体实际所决定的。当然，也可以对革命和革命家的概念，赋予较为广泛的内涵。大而言之，革命之中，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那么，主要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自然可以分别称之为政治革命家，经济革命家，文化革命家。鲁迅既然所从事的主要是文学—文化革命的活动，当然称之为革命家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85页。

也无不可。但必须紧跟着指明，从整体上说他不是从事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革命家，而是从事文学—文化革命活动的革命家。不具体指明鲁迅是文化革命家，而过多过重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认识、评价鲁迅，便显得不那么准确苛刻了。

那么，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的真正含义呢？这就要仔细地认真地领会毛泽东论鲁迅的具体语境及真切含义了。请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是放在该文的第十二部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里讲的，是从近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发展上，高度评价鲁迅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而且他在讲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之前，还明确地称鲁迅是五四之后产生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在讲完“伟大的革命家”之后，又进一步总结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三部分《四个时期》里，毛泽东又强调“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很显然，就毛泽东对鲁迅的总体评价及其实质而言，是从中国文化革命的角度来立论的。以往的许多研究者常常离开“文化”这个总视角、总观点、总内涵去分别解析三个“家”，特别是从政治角度来阐释鲁迅，实际并不真正切合鲁迅的本体实际，也未真正抓准毛泽东论鲁迅的总体视角和根本旨意所在。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本书拟以“文化巨人”作为鲁迅的基本特质，从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和阐释鲁迅。

既然如此，为什么本书明确标示鲁迅是“文化巨人”，而不采用传统的“文化革命的巨人”的提法呢？我们这样做的依据和动机是：相当长时间以来，海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鲁迅在近现代的中国文化演变过程中，只是进行革命，进行批判，只会破，不会立；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也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①他们往往从这类观点出发，认为在当前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鲁迅已经过时，他那些革命的批判的东西已经失去现实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回顾以往的研究，常常多侧重于讲鲁迅的批判方面，强调他的全面彻底地破旧，而对于他的正面的主张，他在批判和破坏进程中所渗透所追求的建设性的思想观点内涵，则开掘、归纳、

^① 转引自袁良骏《为鲁迅一辩——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阐释得不够充分，不够突出，不够有力。为了更真实更全面地再现鲁迅的本体特质，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颇，恰当地处理好鲁迅的破旧与创新、破坏和建设的关系，我们决定不采用“文化革命的巨人”的提法，而改用“文化巨人”作为全书的总观念。

回顾过去鲁迅研究的历史，《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与中国文化》之类论著的出版并不鲜见。作为后来者，本书必须精心地设计自己新的框架，体现自己新的特色。否则，便失却了今天另行编撰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本书在总体建构上力求突出哪些主要特色，实现哪些学术追求，从而与以往的同类著作明显地区别开来呢？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多维视野。

从狭义的文化范畴，即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看，可以说鲁迅是带百科全书性质的伟人。他在文化的众多领域，如文化学、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创作学、编辑学、批评学、美学、艺术学、语言学、翻译学、学术史、文化史、历史学、教育学等理论和实践的众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建树，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不少新的东西，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像鲁迅这样，涉足的领域如此之广，建树的方面如此之多，独自的特色如此之显著，是颇为罕见的。本书题名“多维视野”字样，正是为了体现和突出鲁迅的这一特点。依据这一认识，我们潜心于鲁迅在文化领域的多向开拓，力图比较全面地阐释他的多方面的成就，从而展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伟大贡献和重要历史地位。当然，所谓“多维视野”，并非无所不包，穷尽了一切方面，但大抵可以如此说，鲁迅在文化领域里的主要方面，本书是包容进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此书大体能够窥见鲁迅的基本风貌，可以获得对鲁迅的全面了解。我们认为，在鲁迅研究中，需要多维视野的宏观文化审视，需要对鲁迅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文化探究。

其次，求异创新。

求异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根本要求和生命所在。不能突破以往的研究水平，实现新的学术增值，便失却了编撰的价值和意义。故而，本书自觉地把学术创新作为撰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本书所刻意追求的又一特色。我们潜心于对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海内外）的调查分析，正是为了切实把握我们研究的学术背景，以便确定自己的学术起点，寻求求异创新的思路。就全书的整体结构来看，我们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积极吸收融合有关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以此为参照，对鲁迅

进行新的理论阐释，赋予鲁迅研究以新的理论深度和思辨色彩。其二，借鉴有关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研究方法的革新和新方法的运用）的优长，开掘过去研究未及之内涵，在解决鲁迅研究中的空白点、薄弱点、分歧点、偏至点、困难点方面，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赋予鲁迅研究以新鲜感和创造活力。其三，以史的眼光和尺度，从相关人文学科发展史的长时段上，通过严格的比较筛选，重新探究鲁迅在哪些重要方面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能比较准确地揭示鲁迅的成就和贡献，赋予鲁迅研究以清晰的历史感和扎实的可信性，体现史家风范。

最后，历史反思。

本书作为世纪之交编撰的学术专著，应该自觉而认真地进行历史反思，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所经历的历史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所出现的主要缺失，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不过，我们所作的历史反思，不是采用鲁迅研究史或研究述评的形式，具体地描述鲁迅研究的历史过程、阶段性特征，评介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而是重在把握鲁迅研究的总体态势和重要倾向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此作为我们研究的借鉴和创新的参照。实际上，本书的总体视角的确立，体系框架的建构，观点方法的阐释，都是在认真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获得的。在具体章节的操作中，或单设一个专门题目，评介过去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重大研究偏向，尤其是那些当前仍未真正解决、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以便帮助读者（特别是不大知晓往昔研究历史的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经验教训，增强思想的识别力，把握今后的发展趋向；或不单设题目，而穿插在有关论析中，结合进行简要的评介，画龙点睛，起到上述的作用。同时，从编著者的角度说，通过历史的反思，头脑可以更加清醒，立论可以更加心中有数，学术的起点，突破的重心，补正的指向，整合的依据，确实显得更为明晰了。这自然对我们的写作大有裨益。

总之，本书力图运用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史的眼光和尺度，从多维视野对鲁迅进行宏观性的综合文化探究，重新阐释鲁迅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我们的目的不是机械地将鲁迅分解为许许多多方面的专家，而是尽力贯通、融汇这诸多方面的内涵特点，贴近乃至还原一个整体的文化巨人的本体风貌和历史存在。我们觉得，对鲁迅的这种多重文化探究，将有助于为下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准备条件，并为学术文化界、高校文科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学习研究鲁迅的系统性参考书。这就是我们二十几位学人合作编撰本书的目的动机，也是我

们所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至于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要接受学术界的检验和鉴定。

二、人文学科理论的吸收与融合

人文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集合体。它包括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法学等众多的专门学科。这些专门学科不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自身向更完备、更深刻、更坚实、更新颖的层次提升，而且能以其强劲的活力，推动着姊妹学科的成长和进步。人文学科间的这种互依互渗互补互动关系，在 20 世纪的学坛上所呈现的态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和突出。尤其是近 20 年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人文科学的嬗变革新。它们的整体思路在拓展，学科的创新力度在增强，理论深度在加大，融汇趋势在加快，新兴交叉边缘学科在迅猛崛起。学界的有识之士应该密切关注这种新的学术态势，自觉地敞开自己的胸怀，以极为开放的眼光，极为谦逊的心态，自觉地主动地吸纳姊妹学科，特别是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成果和经验智慧，融合其在观念、视角、框架、术语、操作等方面的优长，以增强其自身的更新机制和生命活力，提高其理论深度、学术高度和创新力度。

如前所说，鲁迅研究是一个坚实、丰厚的学科，相当富有学术活力。但也毋庸讳言，它的理论品位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学术视野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前进的步履尚有待进一步加快，创新的力度尚有待进一步增强。鲁迅研究要在一些重要和重大方面取得突破，继续站在学术的前沿位置，切实发挥其学科带动引领作用，只靠在自身领域里转悠是极不够的，必须以巨大的胆识和魄力，积极吸收和融合姊妹学科的学术成果和经验智慧。这是一条捷径，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否则，就会走向封闭，陷入停顿，日渐式微。

那么，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对鲁迅研究有哪些重要意义和价值呢？简言之，大抵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文学科的成果有助于拓展鲁迅研究的思维空间

相关的姊妹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学术领域和研究优势，都在以坚韧的努力逐渐丰富、拓宽自己的思想视野，建构日渐恢弘、日渐坚实的体系模式。这是一笔巨大的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冲破以往由于学科的过细分工而导致的狭窄封闭状态，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些虽有所了解、

但所知不多不深的姊妹学科领域,就会有一种新鲜之感,开阔之感,丰厚之感。会惊喜地发现它们竟有那么多的视角,那么新的观点,那么广的思路,那么完整宏大的格局,从而受到震动,受到启示,受到激励,会情不自禁地去择取那些与鲁迅本体相关联、相贯通、相契合的部分,用以开辟鲁迅研究的新领域,展开新的思路,确立新的观点,建构新的格局。这样,就会使鲁迅研究的眼界变得更宽广些,构架更宏大些,内容更丰厚些。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主题学,原本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个概念,现已成为文艺学的一个分支。当今的主题学研究已冲破原先的局限,获得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它不再仅仅局囿于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学体系中的表现,以及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演变情况和规律,而拓展出一系列的重要课题。如主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题形成的多重机制,主题和题材、素材的关系,主题和人物形象、特别是与主人公以及与意象的关系,主题的表现技巧,主题与作家世界观、艺术观、审美理想的关系,主题与副主题、多主题的关系,主题的多重分类,主题的模式,主题与母题的关系,主题与传统的关联及现代化扩展等等十几个方面。这些内容,过去的文艺学著作虽有不少涉及,但很少包容得如此广泛,如此众多。文艺学新思维成果的出现,有力地启示我们去开辟鲁迅创作主题研究更为广阔的领域。我们正是借鉴这些成果思路,对鲁迅创作中乡土、童年与启蒙这三个重要的主题进行了新的解读,不仅归纳了鲁迅主题的基本模式,探讨了鲁迅主题与中国文学主题(母题)的关系,它对中国文学创作主题的丰富、深化和拓展及其对后来新文学主题发展的意义,而且以此为参照,反思了以往鲁迅创作主题研究中由于没有辩证地把握主题与人物形象、主题与思想内容、作家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复杂关系所形成的种种偏向,从而使鲁迅创作主题的研究获得新的推进。

人格学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课题。但近几十年来中外人格学的研究成果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样能给鲁迅的人格研究带来巨大的启发。现代人格学把人格的主要结构要素分为道德、意志、智慧和审美等部分,注重阐释其中的多层构成内涵,探讨这几个层面的充分发展及其协调程度对人格建构的意义。另外,它还重视研究现代人格与古代人格的联系和区别,探究东西方人格的差异与互补,现代人格的发展对将来的人格理想的建构的价值,现今在拜金主义、权威主义、解构主义的冲击下发展健全人格的必要性,研究人格学理论的迫切而重大的意义,等等。这些理论思路和框架模式,无不给鲁迅的人

格学研究以巨大的助力,使我们可以从结构内涵、发展程度、协调关系、主要范型、古与今、中与外、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多向联系、多种比较中,建构丰富的深厚的鲁迅人格阐释的总体格局。

(二) 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有助于开掘鲁迅研究的思想深度

新时期以来,哲学研究不断突破机械论、绝对化、片面性的弊端,使思想不断获得解放,观念不断获得更新,活力不断获得增大。在哲学研究的有力推动下,人文学科无不以积极的姿态,迅速调整自己的理论观念,修正自己的思想偏颇,对以往已经开拓的诸多领域,重新进行审视,重新进行开掘,使不少从前浅尝辄止的观点深化了,长期停滞不前的观点刷新了。这些理论的新成果、新趋向,大大推动着鲁迅研究向新的深度掘进。这里也采取举例的方法说明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铺天盖地、政治运动日趋激化的年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过分地强调斗争的绝对性: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而不太讲同一性;讲新与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在特定条件下的关联性;共存事物之间的互渗互补互动性被排斥、抹杀了,中间性的状态和中间性的力量被否定了。实际上,一种新的东西的产生,既是对旧的事物的否定,又是对它的某些合理因素的继承和吸收,而不是彻底地绝对化地摒弃一切。哲学界甚至还强调提出了“一分为三”的理论命题。借助于这些新的理论成果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阐释鲁迅早期、中期(或称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的联系性、一致性,充分揭示进化论、尼采学说、存在主义等思想理论在鲁迅后期思想中继续以新的形式存在着、发展着,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对后期鲁迅的吸引,及鲁迅对它们的吸收、融合和改造,由此显示出文化巨人鲁迅善于博采众长、融合一切有用思想艺术因素的良好素质和生命活力。新时期以来对神化领袖、神化伟人的思想的解构,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过去神化鲁迅的偏向的匡正,将鲁迅的世俗性的一面(当然是非主要非主导的一面)描述出来,促进人们不仅认识鲁迅的可敬,而且认识鲁迅的可亲,使对鲁迅的认识评价获得了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的品格。正是由于辩证整合意识的强化和趋于成熟,学人们对纠正神化鲁迅倾向过程中所出现的另一种偏向,即把鲁迅世俗化为刻意追求个人名利、喜欢奉承、好当文坛领袖的凡夫俗子,也能敏锐地发现,并表示不愿苟同的鲜明态度。坚持英雄主义的主导性格和某些世俗特点的有机统一,反对神化和丑化、俗化鲁迅的多种错误倾向,显示出鲁迅研究界对鲁迅的整体认识已达

到一个新的深层境界和准确程度。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理论观念的更新,也不断推动着鲁迅研究的深化。文学研究从着重于对文学外部构成和规律的研究,推进到着重于对文学内部构成和规律的探讨,迅速地把鲁迅小说作为镜子(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镜子)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推进到对鲁迅的精神结构和心理世界的深层开掘。创作方法的多元化的研究成果,则引导学者去探寻鲁迅创作方法中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及其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即使对鲁迅现实主义的理解,也超越了写真实、典型化的单一模式,而向心理现实主义、开放现实主义等复杂形态掘进,揭示出鲁迅创作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创性特色。关于文艺的民族性、现代性和个性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则又从更宏大更深邃的视角,促进了对鲁迅的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认识。

(三) 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有助于丰富鲁迅研究的学术术语

当前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界正在研讨如何建立和完善学科的话语系统问题,要求实现学术话语的丰富性、独创性和个性化。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整体和主导方面看,吸纳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操作方法,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内在联系性(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决定,如创作方法、艺术形式、思潮流派等,这些术语概念既是整个文艺学的,也属于鲁迅学和新文学史学的。人类学术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单一学科的机制潜能,根本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话语—术语系统,而必须从众多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吸收借用它们的话语资源。过于强调学科自身的创构性,拒绝吸收其他学科的话语—术语,只能使自身走向封闭,走向贫乏和衰落,甚至可能会陷进严重失语的困境,使话语的丰富、准确、优美的生成机制丧失殆尽。因此,我认为鲁迅研究应该大胆地吸收、借用、移植化用其他人文学科的语汇、术语,从而使鲁迅研究的话语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时代感和表现力,并有效地实现同相关学科的交流与沟通。如文化学中的文化丛、文化心态、文化替代、文化剥夺、文化景观、文化黏合、文化模式、文化熏染等词语,思维学中的多元思维、单一思维、逆向思维、怀疑思维、求异思维、创新思维、解构思维、立体思维、发散型思维、收敛型思维等词语,大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当然,在吸收、借鉴其他人文学科话语—术语时,不能机械地搬用,生硬地套用;而要注意同鲁迅思想创作的一致关联性和协调契合性,力求做到吸收有选择,运用颇贴切,融合很自然,

化用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呼唤新概念新术语的诞生。只要我们放开眼界，从中外丰富的语言资源中潜心地发掘，机智地选用，审慎地创造，新的人文学科的语言世界会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的；鲁迅研究会大受其惠，逐渐建构起更加完备、更加精密、更加生动的话语系统。

三、人文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更新

如何认识和评价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出现的那场汹涌澎湃而来、却又似乎匆匆消歇的“新方法”热潮，学人们在观念和感情层次上的分歧是相当大的。有的学者认为：“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文化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无力感，他们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流于苍白，从而失去了有效性和听众。于 1995 年之后，这些来自西方理论的声音日渐稀薄，其实践者也在尴尬的境地中颓然退场。这一危机可能更为深刻，它表明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同时亦表明，单纯地追逐西方理论话语，同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因此，对西方话语的崇拜者和信奉者说来，这一挫折同样使他们深怀失败感和失望情绪。”^① 有的学者的看法则不同，认为：“‘新方法热’与市俗生活中不时出现的形形色色赶潮现象毕竟不同。它不是历史河流表面泛起的泡沫，而是其深层悸动。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和对文化转型的追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门打开之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汲取西方文化的热情，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变革传统思维方式的内在要求。尽管它早已是明日黄花，风光难再，但它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已经融入那巨大的历史天幕，成为辉煌的一角。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实绩虽然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鼓舞人心，但拉开一点时间距离，它的历史意义便逐渐显露出来。它拓展了文艺批评的思维空间，促进批评家思维方式的变革。而由此引发的方法论的大讨论，则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放体系形成的重要开端和新时期文艺批评自觉意识觉醒的突出标志。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一次历史转型。”^②

回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新方法热”进入高潮之时，我正忙于别的

^① 许明主编：《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 27 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94 页。

^② 朱栋霖主编：《文学新思维·序言》（林兴宅撰），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 页。